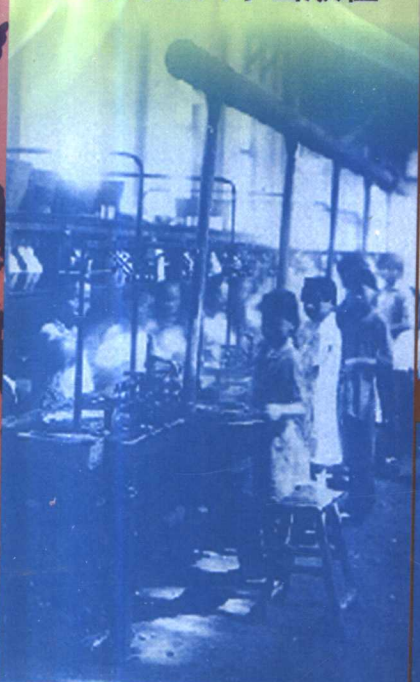




近代上海工业企业 发展史论

黄汉民 陆兴龙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JINDAI

SHANGHAI

GONGYE

QIYE

FAZHAN

SHILUN

1200234724

近代上海工业企业 发展史论

黄汉民 陆兴龙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黄汉民,陆兴龙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9

ISBN 7-81049-455-4/F·380

I. 近… II. ①黄… ②陆… III. 民族资本-工业企业-经济史-上海-近代 IV. F4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967 号

JINDAI SHANGHAI GONGYE QIYE FAZHAN SHILUN 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

黄汉民 陆兴龙 著

责任编辑 王 芳 封面设计 周卫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件: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装订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8.875 印张(插页 2) 230 千字

印数: 0 001—2 000 定价: 27.00 元

序

看过黄汉民、陆兴龙两位先生的书稿《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脑子里浮现出1979年我初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种种情景。黄汉民先生和我曾为《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一书的修改合作过一次，记得一起去拜访过几位原工商业者。该书序言中说，1979年夏秋之交，作者曾拜访过长期担任大隆机器厂厂长的严庆祥，那次就是黄先生和我一起去的。

黄先生和我合作搞课题的机会不多，但长期以来他一直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他是属于那种耐得住寂寞、板凳一坐十年冷、对工作极其认真的人。他十分注重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甄别，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做各种统计。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曾得到过他巨大的帮助。其实，他乐于帮助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来自国外，还是国内；不管你是为了搞研究课题，还是为了撰写学位论文。只要你来到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黄先生都会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几乎所有来访的外国学者和先生都十分称道这一点。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敬业精神和文化精神吧。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经济史研究工作者有研究个案的传统，曾搞过多家上海的本国或外国企业的研究，如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永安百货、英美烟草公司等，相比之下，整体性的研究则不多。《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从整体上研究近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在学术上是有价值的。

《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是一项整体性的实证研究，对资料的掌握要求很高。作者既是长期从事经济史研究的里手，又是善于进行史料甄别的能手，运用资料得心应手，去伪存真，甚是

得体。除了过去长年积累的资料外，作者还充分运用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收藏的大量资料，并去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等处补充搜集资料，使该项研究建立在扎扎实实、翔实可信的基础之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繁杂的史料中总结规律，也许是更困难的工作。本书在这方面作了很有益的努力。作者提出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观点。例如，在分析了民族企业几次“设厂热潮”的上海经济背景后指出，那些只图产品一时好销利大而盲目创办的工厂，因不注重巩固企业的基础，很快被历史淘汰；论述了近代上海公司制企业所占比重甚小的原因，探讨了公司制企业高度集权管理的利与弊，并从企业发展的历史中，论证了企业管理体制从集权管理向分权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分析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企业发展集团化趋势的特点及其对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在论证规模效应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大、中、小企业的同时成长是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企业负债经营的利弊作了客观分析，并分析了过度负债可能造成的各种风险；提出了评判企业科技进步的标准，概括了企业科技进步的特点；总结了近代上海企业在企业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强调了企业家对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等。本书所总结出的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份有益贡献，趁作序的机会，谨对两位作者表示诚挚敬意。

杜恂诚

2000 年 3 月 6 日

前 言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上海企业发展趋势研究——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模式及其盛衰比较实证分析》的最终成果。这项课题以近代上海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些企业发展变化的趋势,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第一本从总体上论述近代上海民族资本工业企业发展及其规律性的著作。当然,这项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尝试,对近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发展趋势也只是描述了一个大概轮廓。如果本书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近代中国工业发展问题的认识,有助于促进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上海近代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并对当前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有所启迪的话,则正是我们所期望和感到欣慰的事。

本课题的研究和最终成果的出版,先后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在课题研究进行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马伯煌教授、沈祖炜研究员、杜恂诚研究员、复旦大学陈绛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郭庠林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黄逸平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以上几位专家还对课题成果进行了鉴定,杜恂诚研究员还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评审委员会的专家们也对书稿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对此,作者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曾先后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上海

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沈秋生、张健、黄凤莲等同志为资料搜集、整理和书稿打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研究近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发展趋势,必然要涉及到众多的企业档案、文献资料,在本书成稿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有关史料仍在不断地被发掘、发现,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更趋合理。为此,我们敬请学术界的同仁和读者对本书的不足之处乃至缺点、错误批评指正。

作 者
2000年6月

目 录

..... (84)

绪 论

他人的经验与教训,自身历史的回顾与研究,对任何事业的继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企业的历史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过程。研究企业的历史发展过程与研究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一样,其任务在于“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①。这就是说,研究企业历史发展中的盛衰变化轨迹,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懂得的。急功近利、只图眼前获利者,大有人在。这类企业家不重视企业本身历史的研究,尽管他们可以一搏赚取利润,但是,这种企业的活动往往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中,有些企业纵然一度有过辉煌的业绩,然而因为不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一碰到风浪就一筹莫展,企业的发展便停滞不前,甚至持续滑坡,直至倒闭。这类例子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与这类企业家不同,有战略意识的企业家往往很重视研究企业本身的历史,从中总结出企业经营活动的经验教训,作为制定企业发展方针的重要依据,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新的发展。

一些国外著名的企业,一般都十分重视自身企业发展史的研究,有自己的企业史专著;有些企业还设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专门从事企业史的研究,通过总结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为企业今后的持续发展提供借鉴良策。在近代上海,也有一些著名的民族资本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家很重视自己企业的发展历程,不过,他们往往都是在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之后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回顾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虽然它们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新兴生产方式,但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国家,民族资本工业时时处处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和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压迫和打击,使它不可能真正地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另一方面,民族资本工业又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它们还有相当多的依赖性,而结果却始终摆脱不掉所处的危难境地。因此,近代中国的民族企业资本家阶级,既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对抗性的矛盾,具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同时又与它们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对革命表现出软弱性。这种被毛泽东称之为“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格,决定了民族资本企业家及其企业不可能改变自己面临的厄运。历史表明,民族资本企业只有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国家经济独立发展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它的发展才有可能出现一线生机。近代上海有一些民族工业企业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开始意识到从自己的遭遇中总结企业历史,为企业寻找新的出路。荣德生是这类民族企业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荣德生同他的胞兄荣宗敬创办的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面粉工业企业和棉纺织工业企业。荣氏兄弟自20世纪初投资开设工厂以来,企业经常面临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企业规模不再有什么大的发展,陷入了空前的重重危机,以致险些被外资势力和旧政府官僚资本势力所吞噬覆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创立的大半企业又惨遭毁损。然而,荣德生依然雄心勃勃,决心重振事业。1942年,他开始编写自传年谱,记述了荣氏企业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了企业盛衰变化的种种原因,并从实现国家工业化高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从中认识到,中国要抵御外国的侵略,摆脱贫困,富强立国,必须自力更

生,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民族工业经济体系。他强调,必须大办工业、大力发展本国的机器工业,同时还要发展农业、重视教育和培育人才,这些都是实业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几个方面。因此,荣德生把企业未来的发展与国家实业建设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重新设计了一个创新局面的宏大企业计划。这个计划在继续发展原有的面粉工厂和棉纺织工厂的同时,又创办麻毛纺织厂、机器厂、贸易公司等。为配合企业的发展计划,荣德生还兴办了专业教育事业^①。这个新的企业发展计划,因时局关系未能实现。事实上,在旧的社会制度下,这个计划即使得以实施,企业发展的前景依然不会是乐观的。但是,从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个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组建的集面粉工业、纺织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和商贸为一体的企业集团,却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种完全崭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它在企业的整体发展趋势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有些企业家还善于从企业的经营管理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例如,在近代上海工商业中颇有地位的郭氏永安企业系统,它开创于香港、发达于上海,其创始人郭乐在历经数十年工商业的经营之后,为图进一步发展,深感总结历史经验的必要性。他说:“事业非检讨既往,不足以创造将来。”^②还在1948年时,其弟郭泉已撰有《四十一年营商之经过》一书;1960年重修增补,更名曰《永安精神之发轫与长成》。其时,郭氏永安企业系统主要集中在香港一地,为使“永安精神”能够“继往开来,发扬光大”,郭泉在书中总结了10条、30个字的营商经验,即严稽核、重招徕、礼顾客、树模范、任人才、善采办、慎出纳、绝投机、励储蓄、肃家政。并指出,永安企业系统“组织庞大,业务日繁,事权分掌,各有岗位,尤须彼此同心,团结合作,守望相助,勿以小我而忘大

① 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江南大学荣氏研究中心1989年重印本。

② 《郭乐自述回忆录》,1961年刊印。

我”，才能使“永安精神，垂诸永久”^①。在永安精神的激励鼓舞下，永安企业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有的企业家，在新的历史时期还把总结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赋予新的意义。如大隆机器厂的老厂长严庆祥，在新时期的企业改革中尤为注重借鉴历史的经验。1979年夏秋之交，作者曾拜访过严庆祥，是年他已82岁高龄。大隆厂创办于1902年，是近代中国机器工业创办较早、规模较大的一个代表性企业。严庆祥于1916年进厂代父主持厂务工作，1919年起任厂长、总经理。当他知道我们是从事企业史研究的工作者之后，兴致甚高，话匣子一打开，便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言谈中，他一再强调，企业留存的历史资料，是一种“无价之宝”。他谈及大隆过去的治厂经验，并把它与日本丰田集团的历史发展相比较，为大隆的改革发展提供良策。这个经验之谈，后来被收录在《师竹翁传——严庆祥先生逸事》一书中^②。这些企业从自身历史发展中总结的经验和教训，是企业员工所熟悉、也易为企业员工所接受的，当然有利于推动企业的发展。但是，没有一个企业的经验是完整的、十全十美的。从众多企业的历史发展中归纳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特点，虽然在这些特点中所反映的某些内涵有着时代与环境的歷史规定性，但从企业发展趋势的规律而言，它们对于企业在任何时期的发展决策，都会给予人们重要的启迪，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在实践操作上也富有参考的价值。

作为经济发展的实体、城市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又是城市社会的重要基层组织，企业从经济生活上满足了人们生存所需的经济要求，又从社会生活上维系着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对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生活的安定都有直接的影响。研究社会经济史也就必然会把企业发展的历史作为重要的组成内容。最近十多年来，企业史的研究在国内开始受到较多的

① 郭泉：《永安精神之发轫与长成》，1961年刊印。

② 秦建君：《师竹翁传——严庆祥先生逸事》，台北1990年刊印。

注意,先后出版了一批企业史(包括行业史)的专著和专题论文,不仅为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而且在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企业史研究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越来越被学者所重视。

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城市,是旧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发展与近代企业的兴起及其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的发展始终是构筑上海城市近代化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上海开埠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步步渗入并迅速扩张起来,成为在华外资势力的最大据点。外资企业在上海主要的经济部门中占有重要的乃至控制的地位。虽然本国资本企业(主要是民族资本私人企业)因受旧中国社会制度的制约,在外国资本主义强大势力的冲击和压迫下,始终处于畸形落后的状态,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但它在全国各地的民族资本企业中终究是一个行业门类最多、投资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城市。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即近代上海的民族企业是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下来的,企业活动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企业盛衰变化有些什么特点。这些就是本书试图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它们对于当今深化企业改革、推进企业发展,也会带来有益的启示。由于工业很早以来就成为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主导部门,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其中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在上海城市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书将以民族资本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工业企业发展变化的实例分析入手,对企业的历史发展趋势作综合性的探讨和研究。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概述近代上海工业企业产生的特点、企业数量发展的趋势及企业结构的演变状况。第二章和第三章论述上海工业企业组织发展模式的历史变化趋势,分析上海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组织群体模式的形成以及大、中、小企业同时成长的特点。第四章论述企业发展与市场的关系,探讨上海工业企业如何立足上海、走向大市场;如何运用市场竞争手段,协调同业关系,促

进企业的发展,树立上海的企业形象。第五章和第六章论述企业内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企业所采取的对策。第七章综合分析近代上海工业企业的发展水平,历史地评价企业发展在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民族资本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并从近代上海民族工业企业盛衰变化的历史性启示中探索企业发展的若干规律。

第一章 近代上海工业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上海工业的产生与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城市社会经济变化有密切关系,并随着上海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城市工业的发展也较快,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带有时代印记的设厂热潮,工厂企业数量呈明显增长趋势。但是,其中不少企业却被历史所淘汰。企业的兴与亡都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的整体状况,与企业结构的演进变化密切相关,企业结构发展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协调的现象,它们又严重地影响着企业自身的正常发展。

第一节 工业企业的产生及其数量发展的考察

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之前,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时期。期间,外国资本工业首先在中国出现,随后不久,本国资本工业也相应产生。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产生最早、设厂最多、投资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市。

上海自1843年11月17日被迫对外开放、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便把上海作为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据点。它们以上海为中心,大规模地在中国进行掠夺性的贸易活动。19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对华贸易的重心由广州移来上海,上海口岸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地增长,进出港口的外国商船数量明显增多。19世纪50年代末期,每年进出港口的船只从19世纪40年

代的几十艘、一两百艘，迅速增加到 2 000 艘左右。由于对外贸易的崛起、港口航运业的迅速发展，承接船舶修造业务的外资船舶修造工厂也就于 19 世纪 40 年代下半期应运而生，并成为当时稳获巨利的一个重要行业。1848 年英国人编纂的《中英年历》中就有这样一段叙述，那时外国商人在上海经营的各种行业中，“造船以及与造船有关的锻冶、制绳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经营这个行业的气势和冒险心，在上海哪一个行业中都看不到”^①。19 世纪 50 年代以后，外国资本在华设立的船舶修造厂愈益明显地主要集中到了上海。据 1850~1859 年的资料记载，外国资本在华新设的船厂共有 18 家，集中在上海一地就有 12 家是有关修造船舶的工厂和行号^②。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西方列强凭借新的不平等条约进一步获得了长江流域和沿海一带的航行权，对外通商口岸扩展到全国许多地方，外商通过上海联络各口岸的贸易又进一步迅速扩大，以致上海外资船舶修造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张时期。从开埠以来至 1894 年的大约半个世纪中，外资先后开办的大小船舶修造厂有 27 家；经过兼并改组，1894 年继续开工的共有 8 家，资本总额达 323.8 万元，在上海外资工业总资本额中占到三分之一，成为上海外资工业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一个行业^③。这是由于口岸贸易的发展、航运业的兴起而在上海最先出现的外国资本工业。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加紧掠夺中国的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从上海出口的生丝、棉花、皮革、蛋品等贸易明显增长，因此，为这些出口商品贸易服务的缫丝工业、轧花工业、制革工业、蛋品加工工业，以及因出口包装需要的机器打包工业等便在上海相

①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48 页。

②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64 页。原资料为 11 家，另外还有一家 50 年代末美商霍金斯(E. Howkins)办的祥安顺船厂。

③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32~333 页。